

新发展理念助推中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型^{*}

张涛 姚慧芹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 北京 100732)

[摘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新发展理念是当前阶段中国经济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的重要抓手。本文研究了五大发展理念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渊源,重点分析了不同发展理念在促进经济发展和转型的地位与作用,为深入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促进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提供扎实的理论基础。

[关键词]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新发展理念;高质量

[作者简介] 张涛(1973—),男,河南信阳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宏观经济预测、政策效果评价研究。

姚慧芹(1982—),女,河南鄢陵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博士后,主要从事经济增长、宏观经济政策研究。

[中图分类号] F0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7071(2019)03-0123-05 [收稿日期] 2019-01-06

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1]那么如何在新时代下促进发展方式、产业结构和增长动能变化,在新阶段下推动质量、效率和动力变革,成为现阶段社会各界面临的重大议题。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五大新发展理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阶段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的重要抓手。因此,深入研究新发展理念精髓,明确新发展理念对于中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核心作用,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社会价值。

一、创新发展居于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人均GDP达到64644元,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已迈入中等偏

上收入地区门槛。特别是2008年之后,随着世界经济步入下行通道,美国、日本、欧盟等主要发达经济体复苏缓慢,中国经济仍能保持中高速增长,对全球经济的贡献超过30%,为世界经济做出了重要贡献^[2]。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经济实现中高速增长并非一帆风顺。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起飞阶段,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要素驱动和投资规模驱动。而进入“十二五”规划之后,随着资源环境约束趋紧,工业初级产品产能过剩,前期粗放式增长带来的负面效应逐步显现。目前中国经济已经步入“新常态”,处于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的关键阶段,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要素和资源消耗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不能满足“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需求。在此大背景下,只有依靠创新发展,以人力资本驱动代替要素、投资驱动,才能找寻到新的经济增长极。这也是创新发展理念居于五大新发展理念首位的原因所在。

创新发展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包括理论、制

* 本文系2017年度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重大项目《新时代新发展理念评价体系与测度》的阶段性成果。

度、科技、文化等各方面的创新。而在早期的经济学研究中,科技创新,或者称为技术创新,是研究的核心对象。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技术作为一种生产要素,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之一。在此方面,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索洛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索洛提出了索洛增长模型,简单来说,该模型将经济增长归因于劳动和资本积累及技术进步。在同数量规模劳动和资本投入下,产出增速大于劳动和资本投入增速的部分,可以由技术进步进行解释,这部分产出余值又称为索洛剩余。索洛增长模型有着一系列严格的假设条件,在真实的经济运行系统中,这些假设条件通常不能全部满足。但索洛余值概念的提出及严格的经济增长范式分析,为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巨大作用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

西方学者试图使用数学工具和经济学范式分析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而中国在践行马克思主义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已经把科学技术的作用上升到了哲学和社会科学的高度。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指出“在固定资本中,劳动的社会生产力表现为资本固有的属性:它既包括科学的力量,又包括生产过程中社会力量的结合,最后还包括从直接劳动转移到机器即死的生产力上的技巧。”也就是说,马克思认为科学是一种生产力。邓小平在继承马克思科学是生产力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充分实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和科学观。

创新发展理念,是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继承与深化。在关注技术创新的同时,还应强调理论、制度和文化等各方面的创新。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必须把发展基点放在创新上,形成促进创新的体制架构,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3]同时还在培育发展新动力、拓展发展新空间、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构建产业新体系、构建发展新体制和创新完善宏观调控方式等多个具体问题方面给予了纲领性指导。2016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进一步将创新驱动发展明确为中国面向未来的一项重大战略,提出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坚持双轮驱动、构建一个体系、推动六大转

变”的总体部署,为中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的“三步走”目标提供强大支撑。

二、协调发展是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重要抓手

发展不均衡,是世界经济发展各个时期普遍存在的全球性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方面西方国家迅速完成战后重建,经济增长走上快车道;另一方面第三世界国家仍处于战乱不断、资源短缺的困境,经济发展踟蹰不前,致使各国之间的发展水平迅速分化。据世界银行统计,1960年,美国人均GDP为3007美元,布隆迪人均GDP为70美元,前者约为后者的43倍;2017年,美国人均GDP为59532美元,布隆迪人均GDP为292美元,前者约为后者的204倍。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现象并非个案。发展不均衡问题不但在国与国之间存在,在各个国家内部同样存在。美国的基尼系数在1990年之前常年保持在0.4之下,近年来有所上升,达到0.44左右;英国从1960年的0.25一路上升至2000年的0.37;德国、日本、印度多年来在0.3—0.4之间上下波动。总体来看,世界主要国家基尼系数多呈上升趋势,多国已经越过0.4国际警戒线。中国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1980年代,基尼系数基本维持在0.3—0.35之间,随后一路上扬突破0.4,在2008年达到高点为0.491,后在近十年有所回落。收入分配不均只是发展不均衡的一个剪影,中国发展不均衡更多体现在区域发展差距、城乡二元发展差距、产业结构失衡、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失调、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不同步等问题上,这些都是中国实施协调发展战略的根本动因。

协调发展理念有着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马克思强调社会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也就是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存在矛盾运动规律,在二者相适应时期,能够相互促进发展;在二者相矛盾时期,则会相互阻碍发展。协调好生产力与

生产关系,可以从根本上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中共十九大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协调发展理念更为注重整体性、系统性和平衡性。贯彻协调发展理念,实施协调发展战略,是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指出“坚持协调发展,必须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正确处理发展中的重大关系,重点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促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在增强国家硬实力的同时注重提升国家软实力,不断增强发展整体性。”协调发展可以有效地促进人口、资本和资源的跨区域、跨城乡合理流动,优化资源配置效率,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可以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间的协调发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还可以富国强军,推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

三、绿色发展是对节约资源和环境保护基本国策的深刻诠释

协调发展注重解决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绿色发展注重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新中国成立伊始,走上了以重工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道路。改革开放之后,依托廉价的劳动力、丰厚的资源禀赋优势,工业化进程大大加快,在短短的30多年时间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迈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在经济繁荣的背后存在资源、环境问题的隐忧。化工、钢铁、煤炭、水泥、有色金属等传统高污染、高耗能、高排放行业奠定了工业发展的基础,也带来一系列气候变化、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等问题。当前,中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转型的关键阶段,由资源驱动逐步转变为科技驱动。在新的发展环境下,“三高”传统工业已无法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需求,也不符合广大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期望愿景,实行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倡导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势在必行。

绿色发展理念的核心在于“和谐”二字。早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古代先贤已对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有了深刻的认识。老子在《道德经》指出:“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在老子

看来,人居于天地之间,是天地之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无论人如何“大”,均需顺应自然规律,受到自然法则支配。孔子在《论语·述而》篇提出“钓而不纲,弋不射宿。”意指钓鱼只用一个鱼钩,不用渔网捕捞;打猎只射飞鸟,而不射巢中之鸟。倡导在人与自然的相处中不破坏不违背自然生息繁衍的规律,在可持续发展基本思想的基础上,实现人与自然的动态平衡。继承道家、融合阴阳、墨、法、儒家部分思想的杂家著作《淮南子》记述“天地运而相通,万物总而为一。”“不贵难得之货,不器无用之物。”说明人与自然万物是有着共同本源的有机联系的整体,各有其内在价值;节制人类欲望,避免过度勒索自然^[4]。由此可见,诸子百家对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互利共生具有较为深刻的现实认识,已形成较为完备的哲学基础。

及至近现代,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认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开辟了新的道路。马克思强调了自然的优先地位,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自然界,不是费尔巴哈在其中生活的那个自然界,也不是那个除去在澳洲新出现的一些珊瑚岛以外今天在任何地方都不再存在的、因而对于费尔巴哈说来也是不存在的自然界。”同时,在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人类需要遵循和尊重自然规律,“一天天地学会更加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的惯常行程的干涉所引起的比较近或比较远的影响。”恩格斯提出“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统治异族人那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相反,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思想论述奠定了社会主义社会和谐发展、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旋律。

绿色发展理念是对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和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继承及发展。习近平提出的“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重要论断,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想,符合中国国情,深刻揭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绿色发展重点解决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和谐共生的问题,在延续并强调坚持节约资源和环境保护基本

国策的同时,更加强调发展绿色经济和加强制度建设,推动绿色发展理念成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真正动力。

四、开放发展重点解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

20世纪中叶以来,全球经济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历史的任何一个阶段。据英国经济学家麦迪逊估算,1950年世界GDP总额约为1820年的7.68倍,用时长达130年;2003年世界GDP总额约为1950年的7.67倍,用时缩短至53年^[5]。1950年之后,世界经济呈指数型、爆发式增长。这一方面归因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爆发,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空间技术和生物工程相关技术的发明及应用大大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另一方面归因于1980年代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作为全球第一大外资吸引国和第二大对外投资国,在国际经济活动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国经济的发展与世界经济的发展紧密相连,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是中国走向富强、民主、文明的必然选择。开放发展理念的提出,是对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一脉承袭。

当代中国在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奉行以独立自主的原则参与国际事务。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确立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中国的开放发展从此进入历史新纪元。张燕生将对外开放分为三个阶段:1979—1991年是对对外开放的初始阶段,主要特征为招商引资和“三来一补”。1992—2001年是市场为基础的外向型经济体制的攻坚阶段,主要特征为汇率、外贸、外资、金融、计划管理体制的改革。2001年后是建立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的开放性经济体制阶段,主要标志是加入国际贸易组织^[6]。自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召开以来,中国的对外开放进入了第四阶段——从开放型经济大国向开放型经济强国转变阶段。主要表现是伴随着中国国力的整体提升,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积极性逐步升高,国际话语权逐步加强,逐步走向国际政治经济的中央舞台。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奠定了中国对外开放的新格局,为探寻经济增长之道、实现全球化再平衡、开创地区新型合作做出了重大贡献。

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2020年中国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35年基本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21世纪中叶,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开放发展理念的提出,为中国由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前行的过程中,扫清了内外发展联动障碍,赢得了广阔发展空间,平衡了中国与世界之间的矛盾。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目前的开放水平仍有较大的优化空间,“走出去”和“引进来”的水平有待加强。完善对外开放战略布局、形成对外开放新体制、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深化内地和港澳及台湾地区的合作发展、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等方面仍需进一步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总体来看,开放发展理念的提出,是对外开放四十年来理论和实践经验的总结,是“十三五”时期我国对外政策的纲领性指导,也是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五、共享发展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

五大发展理念中创新发展是出发点,共享发展是落脚点,与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增强百姓幸福感受最为密切相关。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的共享发展理念主要体现在剩余价值理论和收入分配理论之中。剩余价值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分配方式,以及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本质。而社会主义制度分配方式,与之相比有着根本的区别。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社会可以分为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在第一阶段中,生产资料归全社会共同所有,个人“除了自己的劳动,谁都不能提供其他任何东西,另一方面,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转为个人的财产”。因此,在社会主义第一阶段中,劳动者遵循按劳分配原则,分配社会扣除后的社会总产品,而这恰恰是体现共享发展理念的关键所在。由于生产资料归全体社会成员所有,而全体劳动者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子集,因此在按劳分配之前,社会总产品应该对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进行扣除。这些扣除项目包括补偿消耗的生产资料、扩大再生产规模的资料、公共基础设施、社会保障基金等。这部分扣除保障了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权益,体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下社会全体成员对发展成果的共同分享。社会扣除后的社会总产品按照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的原则进行分配,进一步保证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在追求社会整体效益的基础上,保证了个人利益的实现。

共享发展的概念于2015年首次提出,但共享发

展的理念始终贯彻于党和政府的施政理念之中。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中共十七大进一步指出“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而在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的今天,“公平”的含义已从单纯的分配公平转换为社会公平、转换为共享发展。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必须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深入开展脱贫攻坚,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平安中国,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确保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20多年间,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思

路发生了根本转变,从强调效率,到重视公平,再到共享发展,这种转变适应当下中国与世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情况,顺应人类历史发展根本潮流。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N]. 人民日报, 2017-10-28.
- [2]万相昱, 张涛. 中国的经济增长为世界经济作出了重要贡献[J]. 红旗文稿, 2017(13).
- [3]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J]. 求是, 2015(21).
- [4]吕慧燕. 《淮南子》人与自然和谐思想及其现实意义[J].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2).
- [5]Maddison A. Contours of the world economy 1-2030 AD: Essays in macro-economic history [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 [6]张燕生. 对外开放的历程、发展经验及前景[J]. 宏观经济研究, 2008(10).

Th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s Promote the Transition of China's Economy from High-speed Growth to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ZHANG Tao, YAO Hui-qin

(Institute of Quantitative Economy and Technological Economy ,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entered a new era, and China's economy has changed from a stage of high-speed growth to a stage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Five Major Development Concepts, innovation, co-ordination, green, openness and sharing, are important to tackle development dilemma and bring out comparative advantages in China. This paper studies the origin of the five major development concepts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focusing on the analysis of the status and role of different development concepts in promot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 providing a solid theoretical basis for further implementing th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s and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China's economic structure.

Key Words: Xi Jinping's Economic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New Development Concepts; High-quality

[责任编辑、校对:王月霞]